



中国

孙建波◎著

转型观察

CHINA'S TRANSITION
TO OBSERVE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013029971

F121
200

中国转型观察

孙建波 著



F124
20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35731

17825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转型观察 / 孙建波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81140-693-1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6682 号

中国转型观察

孙建波 著

责任编辑 郑建 谭娟娟

责任校对 周敏燕

封面设计 王妤驰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75

字数 197 千

版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693-1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踏实走进发展与改革的大实验田研究中国现实问题

——孙建波博士新著《中国转型观察》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采取的是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我们把摆脱贫困作为中国实施的第一轮赶超战略的话,过去三十多年来追赶战略的目标是追求从贫困快速迈向基本小康,那么随着 GDP 总量进入世界第二位,中共提出的“两个 100 年”的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意味着中国整体上进入了实施以追赶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第二轮追赶战略。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有条件走在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地方和作为实施追赶战略的第一方阵,早已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开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征程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

第一轮赶超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困扰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面对和有效地解决它们,中国就有可能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通过实施新一轮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在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在这里,新一轮的发展战略是指实施相对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其内涵是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显然,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老大难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逐步解决,只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中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第二轮赶超战略与第一轮赶超战略相比,在发展的背景、目标、重点、步骤、策略等方面,究竟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追赶战略自身还有哪些内涵需要进行丰富和提升? 在“十八大”判断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的前提下,第二轮追赶战略会对我国的长远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发展战略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的关系,未来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发展体制,尤其是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适应发展战略变化的要求? 孙建波博士在其新著《中国转型观察》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具有一定的

启发性。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和滞胀是拉美国家和西方国家曾经遇到过的困境,当前全球是否遇到了技术瓶颈所引发的滞胀?中国能否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重大而又朴实的话题,需要年轻的学者们多多关注。超越一切分析技术的障眼法,踏踏实实走进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大实验田。

我观察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持续且自我强化的危险:技术高超但却无效的分析正在正统化。这种注重招式而不讲究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发展取向。那些在数理统计和经济计量技术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人,就有了某种自我强化的专家型神秘性。并且,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让这一神秘性永久化,从而形成一种学术壁垒。然而,为技术而技术的倾向好像是时尚,但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寿命往往是短暂的。以实验物理来说,实验方法的设计往往比统计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要。

孙建波博士热爱数学,但从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却很少看到数学的影子。这与他关心的话题有关。中国经济是一个改革的实验田,这份实验田中,改革的思路比统计方法更重要。而数学训练的,是思维的方式。不用数学,不代表不用数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实验是不可重复的,而统计是事后的,对于不可重复的经济实验,统计之后,需要更多的思考。改革,需要更多事前的设计和事中的调整,这正是中国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经验。

在这个浮华的岁月,我们不需要锦章绣文和丰词丽句,我们需要的是朴实平和;在这个缺少责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柔和温情,我们需要的是有所担当;在这个严重不公的时代,我们不需要语言承诺,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从细处着手的行动。愿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

长江学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志彪

2013年1月24日

序

中国转型观察,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而且转型是否成功,将决定着“中国梦”能否成为现实。

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使我国实现了30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人口大国的世界发展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我国已进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实现中国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工业化现代化梦想,就取决于我国能否在未来的20—30年中仍能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30年的粗放发展之后,我国面临的自然、经济、社会等极限约束愈演愈烈,如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人工成本不断上升、入世的发展红利基本终结、城市化严重滞后、收入差距过大等等。根据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在这一阶段,积极推进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我国未来转型的基本方向,十八大报告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这就是:“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这意味着:未来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要靠“新活力”、“新动力”、“新体系”和“新优势”,而前两个“新”要靠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后两个“新”要靠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所以,中国转型,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它不仅仅是指日本韩国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面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而且还包含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是“双转型”。

未来顺利推进“双转型”,我国至少应该处理好以下几大关系:一是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改革要纳入发展的框架中。我国的改革周期与发展周期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1978年启动的改革,推进了上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2001年的入世,成就了新世纪前10年的辉煌。而且每次改革的启动,都是上一轮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后开始的。这意味着,这一轮经济周期的启动,必须依靠改革的

深化。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二是传统产业与新兴战略产业的关系。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不可能走发达国家将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的道路,为了解决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必须既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也要保持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所以,我国的产业升级是延长产业链。三是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转变发展方式,要更多的依靠消费的增长,但在保证消费增长的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放弃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向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投资。投资,关键是往哪里投。投资投对了,就是转型升级。四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我国绝不会因为资源环境的压力而放弃发展,放弃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此,我国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以及资源价格改革,以更少的资源支撑快速的经济发展。五是国内与国外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进一步扩大内需,但并不放弃外需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贫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国培育开放型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是仅仅依靠自有资源实现现代化的。

我国“双转型”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学者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大舞台,中国学者一定要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肥沃土壤,在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彰显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的博士后孙建波博士对我国的转型做了独到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对于推进我国的转型研究具有深化作用,在此特加以推荐,并希望他在今后的研究中,随着我国转型的不断深化,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长江学者,辽宁大学校长

黄泰岩

2013年1月25日

目 录

序 1

绪 论 中国向何处去 1

 一、包工头模式：中国增长奇迹的核心驱动力 1

 二、GDP 增长进入次高速时代 3

 三、主流产业升级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5

 四、泡沫破灭为新经济提供廉价要素 7

 五、克服危机综合征 9

第一章 资本市场的信号：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11

 一、消费类股票的涨幅未能持续扩大 11

 二、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提升主流产能的效率 14

 三、中国经济：支柱在切换 17

 四、全球性大牛市寄望新科技革命 22

第二章 通胀结构：经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26

 一、新世纪的通胀难题 26

 二、通胀结构背后的经济转型特征 28

 三、通胀结构折射经济社会变迁 30

第三章 应对滞胀：从制衡分利集团到社会全面进步 32

 一、滞胀之争的焦点与误区 32

 二、长波中的滞胀形成与分利集团强化 33

 三、分利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 36

 四、价格、工资黏性与成本转移 37

 五、扩张、紧缩政策与中国式“滞胀”加剧 38

 六、以制衡分利集团为起点的社会进步路径 40

第四章 主动城市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依托	42
一、危机后的反思	42
二、被动城市化的制度背景与后果	43
三、主动城市化的条件、时机及国际经验	48
四、中国推动主动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52
五、主动城市化的制度保障	56
第五章 产能过剩:驱动信用扩收和政府干预转型	60
一、房地产市场的疑问与错觉	60
二、建筑业周期与宏观经济不稳定	62
三、市场化推动下的中国产能扩张	69
四、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式的反思	71
五、向保障时代的平缓转型	73
第六章 第三次工业化:铸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价值链	76
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76
二、大国产业体系的核心:国家价值链	79
三、第三次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82
四、第三次工业化的实施路径	86
五、保障第三次工业化的社会能力提升	89
六、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90
第七章 企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微观保障	92
一、发展成就与中等收入陷阱隐忧	92
二、企业升级的内涵及理论	93
三、中等收入陷阱特征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效应	96
四、中国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升级问题	99
五、实证分析	105
六、相关的政策建议	108
第八章 对要素投资:有效供给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之路	111
一、“扩大内需”的困局与迷思	111
二、对供给学派的再发现与新拓展	112
三、中国的供给转折与要素价格重估	116

四、向要素投资的动力、方式与条件	119
五、有效供给驱动下的内生经济增长	121
附录 1 新华网专访:稳增长亟需建立成熟社会保障机制	123
附录 2 金砖国家的未来关键要铸造国家价值链	129
附录 3 人民币应成为“中国制造”标价与结算货币	131
附录 4 人口结构变化对当前通胀影响不容忽视	133
附录 5 加快保障房建设或成房地产调控突破口	135
附录 6 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昭示经济转型迫切性	137
附录 7 实施全民安居计划化解三大政策困境	139
附录 8 主动城市化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141
附录 9 嘉兴模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谋求新突破	143
后 记	145

绪 论 中国向何处去

一、包工头模式：中国增长奇迹的核心驱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造就了一个东方神话。中外学者在讨论东亚奇迹时，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持续高增长。中国，将东亚奇迹推向了高潮。

高增长源于高投资。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在中国学者娓娓分析高投资弊端的同时，来自拉美的学者则对这一弊端羡慕至极。中国为什么能源源不断地引入投资，持续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给出的解释耐人寻味：中国地方政府高效率的土地审批模式，保证了中国能够快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确，当欧美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基地时，中国的地方政府能够以惊人的速度规划和审批产业园区，以确保其工业用地。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则是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另一个法宝。在这一方面，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廉价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之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不能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融入当地城镇生活。农民工扮演的只是生产要素的角色。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可能，从而保证了制造业能够持续地获取廉价农民工。

有了土地和农民工，还需要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从而形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有生力量。这个关键纽带就是“包工头”。包工头具有天然的扩张规模的欲望，因其利润的扩张源自规模的扩张。一方面包工头抓住国际市场机遇，积极寻找国际发包者，在中国国内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包工头积极抓住政府这一发包主体。于是，基于出口导向目标的产业在包工头的组织之下蓬勃发展，服务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包工头的组织之下快速推进，从而形成了中国庞大的出口制造业产能、完善的出口物流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出口导向城市群。

包工头天然的规模扩张本性决定了其高投资倾向。为了不断做大做强，每一个包工头都倾向于不断地扩大产能。正是包工头的这一天然本性，形成了中国高投资

率之谜。

然而,包工头规模扩张的源泉在于“接包”。接包这一行为的本质决定了包工头的规模扩张边界在于发包方的规模边界,当计算机驱动的欧美经济增长遇到危机时,当中国制造已经渗入全球市场时,包工头的扩张遇到了瓶颈。同时,包工头向下分包的行为决定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工头会越来越多,当一个民工个体也在琢磨成包工头的时候,包工头模式遇到了发展的极限,这一极限在形式上表现为民工的稀缺。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在于此。

同时,也正是包工头的接包行为本质,决定了包工头的生产是从属型,从属于其上游发包方,本质上并没有创新性。这也正是中国企业在过去三十年学习能力很强,自主创新能力很弱的原因。

包工头模式也决定了灰色经济的常态化。包工头的接包并不仅仅依靠市场规则,市场之外的各类手段都可能在接包行为中产生影响,且成为是否能够获得发包方肯定的重要筹码。这一行为特征在出口产业上形成了包工头之间的恶价格竞争,导致中国出口商品整体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当包工头向政府接包时,政府这一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发包方则面临强大的攻关。由于政府的发包行为不可能得到充分监督,包工头模式的存在也就理所当然地使得腐败常态化,灰色经济制度化。这是一种独特的交易成本。其优点是时间效率极高,从而成为推动高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缺点则是暴露了经济混乱、法律不健全和腐败横行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政府发包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将日益突出。

包工头模式下,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包工头事实上攫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劳动者只能获得维持简单生计的微薄报酬。这正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根源所在。这一分化并不能使用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来调节。包工头的资产并非来自工资薪金,而是其经营所得;包工头的个人消费往往直接以经营成本的形式体现。在这种局面下,个人所得税所限制的高收入人群,恰恰是中国社会最缺乏且应大力培育的科技工作者和职业经理人。显然,过高的个人所得税并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

包工头与现代公司制下的股东有着本质区别。包工头的行为具有随意性,并不受规范的公司章程约束,其行为的法律环境也相当宽松,在很多领域甚至可以无法无天。但正是包工头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能够野蛮生长,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突出重围,快速地融入全球生产。

包工头模式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然而,也正是这一模式,在当前遇到了瓶颈:劳动力成本提高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缺乏创新制约了国际价值分配,腐败常态化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在中国GDP增长减速不可逆转的基本认识下,政府必须从顶层设计的制度建设出发,改造包工头经济,积极引导包工头模式向现代公司制模式转变,全面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内生增长能力。

二、GDP 增长进入次高速时代

中国经济增长下台阶的讨论在金融危机后更加广泛,能维持高速增长의论调也从未间断,其中不乏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支持高速增长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发展阶段还不够高,人均经济指标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工业化并未全面完成,城市化还在深化。高速论者的逻辑简单概括就是:因为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所以就要高速发展追上。该逻辑的形成无疑是因为适应了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对未来能否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地拿差距来判断速度,两者之间也并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发展的差距历来都存在,但真正实现赶超的国家并不多,能够连续赶超的国家更是寥寥无几。经济史上的奇迹首先要数美国奇迹,在过去二百多年来持续赶超并保持领先。其次要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奇迹,成功跟上了世界工业发展步伐。“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复兴奇迹也应该受到重视,在废墟之上如何能够调动力量快速恢复经济,至今仍是谜。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东亚奇迹仍需历史验证,该区域到目前仍未实现大规模人口普遍进入发达经济状态,是否会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仍未可知。

中国奇迹的本质是中国的土地、人口快速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这得益于中国相对集中的决策模式和特殊的土地制度。这一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89 年之前,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内初级产品产出提高,庞大的人口在收入改善之后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对于消化发达国家半导体产品的过剩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内相关产业也开始萌芽;1989—1998 年,这一阶段中国全面学习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承接了半导体产品的生产,亚洲金融危机宣告了半导体产品生产的全球分工走到尽头;1998 年之后,欧美计算机革命和全球航运的大发展带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这一格局在 2004 年之后尤为明显,在金融风暴前达到巅峰。

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本质是快速融入全球分工,这就解释了中国的高资本形成率:以主要出海港口为终点的大物流通道是全球分工体系的纽带,快速建设和更新的机器设备是全球制造业体系的需要。换句话说,是因为欧美的发展需要调动中国的生产要素,从而形成了中国快速增长的资本形成。中国的生产要素能够被快速调动,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速增长的资本形成,是欧美制造业分工的带动,不是内生发展的结果。如果全球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中国源自欧美分工的快速资本形成必然减速。当前,中国已有高速公路超过 8 万公里,基本实现了县级行政单位之间的高速联通;累积建设厂房仓库超过 40 亿平方米;电脑年产能接近 4 亿台,手机年产能超过 10 亿部。这些数据表明,基于出口导向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

内生增长的空间和速度又如何呢?首先,工业化的深化不能延续粗放式的快速

扩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为全球制造工业品的同时,在本土沉淀了优质的工业基础设施,训练了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建立了系统的工业和商业服务体系。这为中国推动内生增长提供了基础。然而,能够集中推进快速增长的要素已经没有了。为全球分工建设的基础设施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产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速度不可能维持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其次,城市化的继续推进也并不意味着高增速的维持。中国的房屋建设产能也已经高得惊人。2011年,中国当年完成房屋竣工建筑面积29.2亿平方米,其中住宅竣工建筑面积18.3亿平方米,分别为总人口的2.17倍和1.36倍,这样的建设进度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仍待提高,但其速度不能和快速的外延式扩张相比拟。

诚然,发展驱动力的切换已经展开,国民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非常明显;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差距就判定过去的增速能持续。我们必须认识到减速的必然性和转型的必然性。转型意味着必须减速。

首先,资本消耗增加影响净国民产出。从发展模式转型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来看,转型意味着不同类型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将加速原有资本的折旧,这在原有投资规模达到巅峰之后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实际产出中,用以维持资本存量的比重就会上升。这将拉低GDP的实际增长水平。而当前全社会庞大产能面临的折旧压力和转型压力比1998年更严重,这将拉低中国的净国民产出。如果伴随着外资的撤离和制造业的跨境迁移,影响会更大。

其次,向消费转型和服务业的发展意味着更低的资本形成率,而资本形成率的降低意味着工业产出速度的降低。同样,在收入法GDP统计中,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资本折旧的减少,不利于资本形成和再生产的扩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在支出法GDP统计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上下,这正是其经济发达但增速较慢的原因,也是其增速能长期稳定的原因。我国最终居民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50%一路下滑至2010年35%,正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深化和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的结果。这一格局的变化将意味着经济增速走向正常化。

第三,社会的转型导致GDP统计遗漏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在工业化初期和城市化初期,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了工厂或车间,这一趋势形成了对GDP增长的贡献。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即便是没有城市化的农村地区,生活资料也多来自工业社会。经济活动未纳入GDP统计的比例已经缩小了很多。

第四,增长的外部性开始遏制增长速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对环境的依赖和破坏。在发展初期,自然环境是支持工业高增长的,而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也未在GDP中扣除。当工业对环境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环境将不再支持高速增长的工业,并且工业发展也必须为过去的破坏买单,从而形成双重的阻碍。二

是生活方式变革带来额外的成本,主要源于人口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从而带来治安、交通、生态破坏等额外成本。

第五,国民幸福感的提升需牺牲短期经济增长。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工作时间。由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初期,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变长了。而当产业工人地位形成之后,随着收入的提高,工作时间在缩短,闲暇和享受开始变得重要。二是人力资本和国民素质。在工业发展初期,童工是难免的,国民受教育时间也较短。随着工业化的深化,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国民更加注重文化生活,尽管这有利于长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当期却是经济中的消耗项。显然,中国目前正处于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加速阶段,GDP增速应该放慢脚步,等一等在工业大增速中疲惫的国民。

站在出口导向产业的巅峰,转型和高增长已经是一组矛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维持高增长。相反,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初步完成现代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应该放慢脚步,稳定住在全球工业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才能顺利转型,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危机就在眼前。

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沿,转型势在必行,否则脚下的泥土必然坍塌。转型意味着过去集全国之力为发达国家打工的单一增长模式结束,要素的回报走向平衡,要素重估正在展开:(1)资本:在新技术应用末期、经济低迷时,资本必须忍受低回报,在资金市场上表现为长端资金价格下行;(2)劳动:生产体系不再具有过剩劳动力,人口红利衰竭,劳动者索要更高回报;(3)创新: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回报呈递减趋势,递减到社会平均回报时,科技进一步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4)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所服务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制度将致力于打破过去形成的不当垄断和不当管制。

三、主流产业升级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们反思导致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的同时,纷纷把目光聚焦于新兴产业。然而,近期一些新兴产业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其业绩并未如预期般强劲增长。对新事物的热情无可厚非,但经历了一年的憧憬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哪里呢?笔者认为,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在新兴科技武装下能够提升效率的主流产业,才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首先,科技进步的方向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最早开始引进或推广的发明创造通常与他们最终被广为传播时所表现出的形式存在很大区别。举例来说,在2009年的时候,电子书的发展似乎前景光明,人们畅想着未来人手一本电子书的情景。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后,新的电子阅读器闯进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电容屏幕的大发展,几乎所有手机和平板电脑都能够作为电子阅读器使用,人们几乎完全忘记了曾

经对电子书的热情。在新的主流科技革命方向尚未明朗之前,新事物是极不确定的。在 19 世纪末内燃机仍以工业应用为主流的时代,很少有人预期到小汽车将走进普通百姓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也没有人想象到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会普及得如此之快;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想到个人电脑竟是最终的趋势。而今,移动互联技术只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发展的延伸,新的科技革命方向尚未明确。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改造主流产业。《剑桥美国经济史》在对 20 世纪美国的科技变迁历史进行回顾后认为,成熟产业采用新技术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甚至促进这些产业中新产品(如合成纤维轮胎)的出现。实际上,得益于新技术在部门间的互相传播,“老”产业的生产力都得到大幅提高。每一次科技革命,高科技都显示出了在改造“老”产业中的潜力,包括纺织业和林业、银行业和金融、零售业和医疗保健。就银行业而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记账媒介和对账方式,全面提升了银行业的运行效率,特别是柜员机的使用,不仅节约了银行的人力,而且延长了银行服务的时间。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所有行业的财务和管理效率,促进了各行各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新兴科技不仅提升着主流产业的效率,同时也在改造着社会基础设施。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对社会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机和内燃机推动了航路建设;小汽车和火车的发展推动着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飞机在民用领域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机场建设;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现代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高速铁路;当前,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成为潮流。伴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建筑业的内涵都在发生着变化。

通过对历史的全面分析,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进步在主流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广泛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看到的是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在新科技武装下的升级。新技术提升着人类的生产效率,拓展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但是,一切创新都并未脱离人类衣食住行用等传统主流领域。

笔者承认,不能充分渗透进入传统行业的新兴科技,只能短期内略占风骚。最终是否成为时代潮流领导者,如计算机与互联网科技发展下的 IBM 和微软者,目前尚不明确。显然,当前并不能确定哪些新兴科技能够最大范围地改造传统经济社会,并成为科技革命的方向。大浪淘沙之下,必有非常优秀的新科技公司,但目前还无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投资者的目光,应该聚焦于在新兴科技渗透下能够复兴的主流行业。哪些主流产业能够复兴?这才是我们要去寻找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也正在朝着“传统复兴”的方向转变:2010 年国庆之前,A 股市场基本上是“唯成分论”的认识观,凡是贴上了“消费”和“新兴”标签的公司,都

得到了热捧。但这一局面在国庆节之后逐渐改观,机械行业指数和建材行业指数渐占上风,表明投资者逐步认识到“充实社会资本”、“提升产能装备”和“改善产业结构”的重要性,资本市场对“传统复兴”的认识正在深化。

换句话说,思考哪些传统能够复兴,对中国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虽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经济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基础设施占有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具有“技术追赶”和“社会升级”双重特征的大型经济体,更应该把发展的力量集中于“充实社会资本”和“提升产能效率”,方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四、泡沫破灭为新经济提供廉价要素

保增长能够推动传统产能与基础设施的更快建设,从而加速其泡沫的形成,为经济转型创造大量的廉价的可供使用的基础条件。没有过剩,就没有泡沫的破灭,转型的成本也就异常地高。当前众多泡沫僵而不破,正是其产能尚未超越社会潜在需求所致。价格泡沫本身才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而非泡沫破碎。

进入2012年以来,虽然各类经济指标进入触底的临界区域,但这个临界区域显然遭遇了L底。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遭遇瓶颈的时候,科技动力缺乏和去产能周期双重叠加,使得经济增速回升难度很大。保增长是否可取?传统产业的泡沫是否可怕?答案似乎很直观:保增长加剧了传统产业泡沫的形成,从而使得远期的崩溃更加可怕。这一逻辑看起来是完美的,但却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目标,也忽视了泡沫破灭为新产业创造的机会。

金融风暴之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困难,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政府保增长的无奈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方向极度不确定,其发展也面临着高昂的成本压力。政府的补贴于事无补,不仅数量上杯水车薪,还总是用错地方。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日渐扩散。我们认为,保增长不是转型的敌人,无须担心保增长会刺激传统泡沫阻碍转型。

首先,产业泡沫意味着产量的上升和极大丰富,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房地产业而言,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的价格泡沫,推动了产量的快速增长。根据建筑业统计,我国每年竣工的住宅建筑面积从1998年的不足5亿平方米,上升到2011年的18.3亿平方米。如果没有价格泡沫,就不会调动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源参与住宅建设。诚然,在泡沫形成过程中,不公平问题难以避免。但当产量严重过剩的时候,泡沫的破灭则意味着价格泡沫带来的分配不公能够得到再平衡。房价调控十年来从未真正奏效,恰恰说明住宅供给仍未达到极大丰富。

其次,旧产业泡沫的破灭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而廉价的资金。产业泡